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8 四川 重慶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8

四川·重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第8卷：四川、重慶/劉長久主編；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66-4881-2

I. 中… II. 劉… III. ①石窟-雕塑-四川-圖集
②石窟-雕塑-重慶-圖集 IV. J. 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40250 號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王朝聞 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副主任

段文杰 敦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副主任

李書敏 重慶出版社社長、編審

委員（以姓氏筆畫爲序）

丁明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周永健 重慶出版社副編審

溫玉成 龍門石窟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劉長久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歐治渝 重慶出版社副編審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分繪畫、雕塑、工藝美術、書法篆刻、建築藝術五大類，本套為雕塑類的《中國石窟雕塑全集》，共十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

二 本卷為《中國石窟雕塑全集》之第八卷《四川·重慶卷》，收入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兩宋、明清的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和摩崖造像。因重慶大足石窟獨立成卷，故不包括在內。收入本卷的作品大部分為佛教造像，少部分為道教和三教合龕造像。

三 圖版編排按四川、重慶各石窟點（不含大足）的窟龕造像時代先後排列，個別窟龕的造像年代或題材內容有歧議者，均在本卷圖版說明中加以評述。

四 本卷內容分總論、圖版、圖版說明三部分，并附四川、重慶石窟（不含大足）造像年表，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分布示意圖等。

四川、重慶石窟造像的歷史發展

劉長久

四川、重慶地處中國西南一隅，東據長江三峽，南鄰雲貴高原，西臨青藏高原，北接秦巴山地，歷來是聯係北方、中原與南方的要衝之一，也是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

四川、重慶既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又是佛教傳入較早的地區。就佛教雕塑而言，四川、重慶已出土了不少東漢晚期和三國蜀漢時期的佛像和帶有佛教特徵的遺物。特別是成都萬佛寺廢址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足以說明四川佛教雕刻的發展已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它不僅是中國早期佛教造像的珍品，而且填補了南朝佛教藝術史的空白。^{〔1〕}

在北方中原石窟雕塑的影響下，四川、重慶于北魏晚期開始鑿造石窟，洎至唐宋時期，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已達極盛階段，元、明、清至民國仍有余緒。長達一千四百年的石窟造像史，令人嘆為觀止。據普查統計，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分布于近八十個縣市，達數百餘處，造像多至十數萬軀，可謂中國石窟雕塑之冠。從早期對北方、中原石窟藝術的汲取和借鑒，到盛唐以後的融合改造，進而自成體系，體現了從民族化到地方化，從宗教的神性化到民間世俗化的嬗變。

在長江流域及南方石窟中，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具有極為顯赫的地位。其題材內容之豐富，藝術審美價值之高，以及道教和三教合龕像之多，是南方其他石窟難以比擬的。

一 東漢和蜀漢四川、重慶的佛道圖像

兩漢之際，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初始，這種外來宗教僅限于王公貴族、官僚仕人的狹小圈內，民間絕少流布。即使如此，他們也未真正明了佛教的經義，僅視為與黃老并祀的一種神仙

方術，即所謂『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正因為如此，東漢到三國時期的佛教圖像，從現存出土的遺物看，大多見于墓葬中的門楣或明器裝飾，藉以達到祈禱冥福的目的。這與當時盛行的神仙崇拜和巫鬼信仰不無關係。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五五年，先後在四川樂山麻濠崖、柿子灣東漢崖墓內發現了佛像。麻濠崖佛像現存于IM1號中後室外門楣正中，為剔地起突浮雕，通高三七厘米，頭有肉髻，項後有圓形頭光，身著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似握衣襟，結跏趺坐。柿子灣佛像現存于柿MI號墓室內，共二尊：一刻于中室門楣正中，通高二八厘米；另一刻于左右室門楣正中，通高三五厘米，與麻濠崖佛像基本相同，祇是保存現狀較差。此外，麻濠崖墓內刻有《禿鷲啖蛇圖》，柿子灣尹武孫墓內刻有《大鵬鳥銜蛇圖》，均與佛教有關。

一九四二年，在四川彭山縣江口鎮東漢崖墓中出土的一件佛像插座（泥質灰陶，編號為MI66：14），高一二厘米，圓形底座有模印龍虎爭壁，座上有一坐佛二站立脅侍，現藏南京博物院。其正中佛像頭有高肉髻，身著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撫膝，結跏趺坐。右脅侍束髮，身著交領窄袖袂，右手置腰間，左手屈肘上舉布掌；左脅侍光頭，身著右袒式衣，右手屈肘上舉布掌，左手平置腹前。^[1]

一九七二年，在四川什邡縣皂角鄉白果樹村馬堆子出土了一方佛塔畫像磚，正中為一佛塔，左右兩側有蓮花和佛塔。

一九八一年，在重慶忠縣塗井卧馬山出土的三國蜀漢崖墓隨葬器物中，有編號為MS：62、MI4：31(1)、MI4：31(2)的銅錢樹，共清理出十四節樹幹，每節樹幹均鑄有一坐佛。此外，還有十餘件陶俑，飾有『白毫相』和蓮花，亦與佛教有關。

一九八六年，四川樂山西湖塘出土的一件東漢陶俑立像，通高二〇·五厘米，着漢式衣冠，冠正中有蓮瓣紋裝飾，右手當胸施無畏印，左手置于腹前。此雖與嚴格的佛像稍異，但與之不無關係。

一九八九年，在四川綿陽何家山第一號崖墓出土的隨葬品中，有編號為HM1：32的銅錢樹，其上分鑄五尊佛坐像，均高六·五厘米，造型特徵與樂山麻濠崖墓佛像相似。

除上述之外，四川宜賓黃塔山東漢崖墓中也曾出土一尊騎于青獅上的佛像。四川瀘州蠻子洞東漢崖墓內一具石棺端頭刻有《共命鳥圖》，此與佛教故事中的一體二頭鳥有關。

從四川、重慶早期佛教遺存圖像看，均出土于東漢晚期或三國蜀漢崖墓中，僅是作為墓室門楣或明器上的裝飾，而非獨立的佛教造像。這與漢代以來的厚葬風俗有關，此風俗首盛于中原和北方漢族。初入中土的佛教，其佛像作為厚葬『冥福』的一種裝飾，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因此，筆者認為四川、重慶早期佛教及其圖像似應為由北方、中原傳入。

東漢順帝時（公元一二六年至一四四年），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張陵入蜀，不久在鶴鳴山（一說在今大邑縣境內，一說在今四川劍閣縣境內）創『五斗米道』（亦稱『天師道』）。漢安元年（公元一四二年），在四川簡陽逍遙山崖壁上摩崖石刻：『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雖未見有道像，但足以說明四川道教發端很早。

原始道教囿于『道本無形』的思想，因而早期沒有造像出現。即所謂『道至尊，微而隱，無狀貌形像也。』^{〔三〕}儘管晉代葛洪在《抱樸子內篇·雜應》中描述了老子的形貌，但道教造像的出現却是在佛教造像在中國興起後，道教看到佛教『以像教化』的確是一種極好的傳播方式，若『欲人歸信』，則必須建造道教自己的神像。之前，道教上清派為使修道者存思、存神，已有一些雜亂無序的神仙，直到南朝後期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才按七個階位排列出近七百神仙名號，並確立原始天尊為道教最高的神。至此，道教神仙譜系才開始走向有序化，到宋代道教諸神才形成龐大的系統。

道教造像起于何時？據《隋書·經籍志》載：北魏太武帝為寇謙之『于代都東南起壇宇，……刻天尊及諸仙之像而供養焉』。北魏始光元年（公元四二四年）魏文朗造佛道像（現藏陝西省耀縣博物館）。據此，道教史學界認為這是中國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早之道教造像，並斷言東晉以前尚無道教造像。^{〔四〕}僅從文獻看，確乎如此。但據考古發現看，在四川劍閣縣碗泉山就存有明確紀年為東晉大興二年（公元三一九年）的道教摩崖造像。從現存考古遺迹觀之，中國最早的道教造像在四川。

道教造像除冠服烏履、老君和天尊面有三綵鬚、老君坐前或有三角夾軾，以及或執符、

笏、玉璋、圭板等外，其窟龕形制、項後頭光或身光、蓮臺，以及三尊、五尊、七尊、九尊等布局，均摹仿佛教造像。就連許多觀念也援自佛教，如『天尊』、『法、報、應』三身、『天堂』、『地獄』等等。道教早期造像題材單純，手法簡拙。

四川、重慶早期佛、道圖像，對研究中國早期佛教、道教的歷史及其傳播途徑和造像的演變具有極高的價值。

二 南北朝四川、重慶佛教造像與石窟緣起

蜀漢滅亡以後，四川、重慶置于西晉統轄範圍。晉武帝曾下令全國禁止民間宗教活動，迫使西晉時四川、重慶佛、道造像活動處於停滯狀態。到了南朝，四川、重慶受梁管轄達五十二年之久，而四川東北部分地區又為北魏所占據。由于梁和北魏君主崇信佛教，因而，建寺造像活動較為興盛。

自清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四川成都萬佛寺廢址出土了二百餘件佛教石刻造像。其中紀年最早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四二五年）所造的《淨土變》（現藏法國），另外尚有南朝蕭梁時期有明確紀年的石刻造像數件。從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到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的十餘件作品看，除少數題材為淨土變外，大多為釋迦佛、彌勒佛、觀世音菩薩和阿育王等題材，既有單尊造像，又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等多尊組合造像。其雕刻藝術之精美，堪稱南朝石刻造像之最。

在成都其他地方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計數十件，其中有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四六三年）王天進、王阿緒、王道暉等造的佛像一軀（現僅存造像拓片）。一九八七年，在成都市童子街和梓潼街兩處的基建工地出土了不少南朝時期的佛教石刻造像，其中有三件可辨紀年銘文：（一）南齊『建元』（公元四七九年至四八二年）；（二）梁『天監』（公元五〇二年至五一九年）；（三）陳『光大』（公元五六七年至五六八年）。一九二二年，在成都市城北報恩堂出土一軀梁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康勝造的釋迦佛石像。在成都市外北鐵路工地上出

土的梁普通六年（公元五二五年）造的一軀釋迦佛石像。特別是在成都出土的梁中大同元年（公元五四六年）造的一軀光明佛石像，題記中造像施主姓名前出現了『邑子』稱謂，這是流行于南北朝時期中原、北方民間結社造像組織『義邑』（或稱『邑義』）的成員稱呼。^[5]以此說明四川、重慶在南朝時已出現民間結社造像組織。

清光緒年間，在成都附近的新繁縣（現為新都縣的一鎮）三會院出土了梁中大通四年（公元五三二年）釋僧鎮造的釋迦佛石佛，以及梁太清五年（實為天正元年，公元五五一年）丁文亂造的釋迦雙身（即指二佛并坐）石像，現均藏重慶市博物館。

一九二一年，在四川茂縣較場壩出土了南齊永明元年（公元四八三年）西涼曹比丘、釋玄嵩造的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二佛均身着雙領下垂大衣，內衣結帶，這種漢制褒衣博帶式服飾，是現存佛像着這種裝最早的，比史籍所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四九四年）改革北族胡服為漢制褒衣博帶要早。此為研究中國服飾史提供了新的實證。同時，西涼僧來四川造佛像，說明當時四川與西涼佛教文化的交流，也證明河西區佛教造像對四川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一九九四年，在成都所轄的彭州市出土了梁中大通五年（公元五三三年）的佛教石刻造像。一九九五年，在成都府南河工程西安路工地發掘了一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其中刻有明確紀年的有：南齊永明八年（公元四九〇年）彌勒成佛石像；梁天監三年（公元五〇四年）無量壽佛石像；梁中大通二年釋迦石像；梁大同十一年（公元五四五年）釋迦多寶石像；梁太清年間（公元五四七至五四九年）阿育王石像。

一九八三年，在四川廣元城關豫劇團基建工地出土了北魏延昌三年（公元五一四年）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市）、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市）顯明寺比丘惠楞與平都寺比丘僧政等造釋迦文佛石像。一九八六年，又在同地出土了北周劉約造像碑。

此外，在四川綿陽東漢平陽府君闕上存有梁大通三年（實為中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刻的觀世音像，梁中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許善造的觀世音大士像，梁太清五年（實為天正元年，公元五五一年）章景造的無量壽佛依碑石像。在成都龍泉驛大佛岩存有北周孝閔帝元

年（公元五五七年）強獨樂為北周文王建立的佛道二尊像碑。這不僅是四川最早的佛道造像，而且碑文所記北周文王宇文泰生平事迹，可補北周史料之闕。

南北朝時期，四川、重慶佛教造像以南朝梁時最為興盛，形制多為扁體形造像碑，雕刻手法或為高浮雕或為淺浮雕，刻工較為精細。這種造像碑形制肇始于北魏，盛行于北朝晚期，并多見于中原北方。而在四川、重慶却盛行于南朝，從四川、重慶造像碑遺物和造像銘文看，主要由于甘陝地區傳入。

四川石窟的開創比上述南朝造像碑稍晚，從現存的狀況看，廣元千佛崖和皇澤寺兩處石窟中有少量北魏晚期、西魏和北周時期的造像龕，如千佛崖第七號大佛龕、第二一號三聖堂，皇澤寺第四五號中心柱龕、第三七號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龕、第三八號一佛二菩薩龕。其龕龕形制和造像特徵受雲岡曇曜五窟和麥積山同期石窟造像的影響。原因在於：一方面廣元是四川的北大門，歷來為中原、北方入川的必經之道；另一方面廣元當時為北魏占據。因此，廣元為四川石窟的創始之地，是順理成章的。同時，證明四川石窟的傳播途徑，不可能是『川滇緬印』古道傳入（迄今為止在雲南未發現唐之前的佛教遺迹），而是由中原、北方首先進入四川廣元，然後由廣元波及川北巴中、通江等地，再由川北地區深入川西、川南和重慶。

三 隋代四川、重慶佛道石窟造像

隋代歷時僅三十七年，雖歷時較短，但二位帝王均篤信宗教，奉佛教為國教，同時也流行道教。據文獻看隋代建寺造像很多，由于諸多原因，留存至今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却甚少。

四川、重慶現存的隋代佛、道造像，主要見于四川廣元、巴中、安岳、蒲江、綿陽、重慶潼南等地。廣元千佛崖第三八號北大佛龕，內刻一佛二弟子，主尊為彌勒佛善跏趺坐像，磨光頭髻，面型扁平，身軀寬厚，頭、手比例稍大，具有明顯的隋代造像風格特徵。此外，從廣元城關鎮移入千佛崖的一軀觀世音菩薩殘像，就肩寬、身軀滯重的特徵看，亦屬隋代造像。廣元皇澤寺第五一號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龕，其造像風格當為隋代。巴中北龕和西龕兩處均存有少量

隋代造像窟龕，如北龕第一、二、一三號，西龕第一八、二一號等，從造像的風格看，似為隋末或接近唐初時的造像，窟龕形制與廣元隋代敞口弧頂，平面呈馬蹄形的窟龕不同，多為屋形龕，龕楣多刻為雙層仰陽板垂帳，並飾有多種紋樣。其中有明確紀年的是西龕第二一號釋迦說法龕，龕楣裝飾華麗，為巴中石窟唐代窟龕門楣裝飾開了先河，這也是巴中石窟較之四川其他地區石窟的一大顯著特點。惜該龕造像毀壞嚴重，不過從一軀力士殘像看，身着百褶長裙，璣珞交叉于腹際，帔帛繞身，肌肉勁健，其雕刻相當精美。這樣的力士造像在四川石窟中實屬罕見。從龕內現存的一則五代前蜀永平三年（公元九一三年）院主僧傳芝的追記中，可知該龕鑿造于隋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除上述廣元、巴中兩地石窟中的隋代佛教造像外，近來在蒲江縣長秋鄉鷄公樹山第一號龕門外左壁，發現有隋大業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的造像題記，說明該處最早的造像鑿造于隋末。

隋代四川、重慶的道教造像主要見于潼南和綿陽。重慶潼南縣定明山大佛寺東面絕壁上現存隋代道教造像三龕：右為七尊龕，主像為天尊，龕右下旁刻有『開皇十一年』（公元五九一年）紀年銘文；左上龕為一天尊二脅侍，龕右側刻有造像題記：『大業六年三月廿日修天尊像一弟子楊佛贊造敬記』；左下龕亦為一天尊二脅侍，無紀年銘文或題記，但與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一天尊二脅侍龕完全相同，應屬同期造像。四川綿陽西山玉女泉崖壁北端存有兩小龕，均刻一天尊二脅侍，右龕有造像題記一則：『大業六年太歲庚午十二月廿八日三洞一道士黃法暉奉為存亡二世敬造天尊一像一龕供養』（該石現已移入綿陽市博物館）。位于玉女泉北面的八小龕，或刻一天尊二脅侍，或刻一天尊二脅侍二力士，從造像風格看，與隋大業六年黃法暉造天尊龕極相似，應視為隋大業年間的道教造像。另據清代劉燕庭《金石苑》載：隋大業十年（公元六一四年）文託生的母親曾在綿陽西山觀造天尊像一龕，題記為：『大業十年正月八日一女弟子文一託生母為一兒託生造一天尊像一龕願生長一壽子福霑一存亡恩被一五道供養』。該龕現已不存。

從個別文獻中，我們可以見出隋代四川、重慶道教造像的一些情況。如唐代盧照鄰《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中記有漢州（今四川廣漢市）靈集觀造『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軀』。

今已不存。《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記有：隋開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為蜀王楊秀造千尺道像。^[1]又如《雲笈七籤》卷一九《道教靈驗記·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中記有：隋大業年間（公元六〇五年至六一八年），在嘉州（今四川樂山市）開元觀（後周所創，原名弘明觀）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2]這些道教造像雖早已蕩然無存，但可以見出隋代四川、重慶道教造像已較興盛。

四 初盛唐四川、重慶石窟的蓬勃發展

到了唐代，四川、重慶雖曾有過一些軍事行動，但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總的來說，四川、重慶的經濟較為繁榮，社會相對也較安定。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書相公見寄序》中說：『時號揚、益，俱為重藩，左右皇都』。^[3]又如陳子昂《上蜀川軍事》說：『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取給于蜀。又京師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國之珍府。』^[4]可見當時四川、重慶在全國所處的重要地位。這無疑為四川、重慶文化藝術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北方藩鎮紛爭不息，唐玄宗避蜀，不少文人墨客、畫家工匠，亦紛紛入川。單就繪畫而言，『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宋代鄧椿在《畫繼》中也說：『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當時成都大聖慈寺佛教壁畫之盛，可謂稱冠于全國。毫無疑問，唐代四川佛教繪畫的繁榮，必然會刺激四川、重慶石窟造像的發展。有的畫家從京城長安帶入四川、重慶不少佛教造像的粉本，也有的畫家還直接參與了窟龕造像的設計。

初唐時期，四川、重慶石窟造像仍然受有北方、中原石窟某些形制、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的影響。該期的窟龕造像主要分布于四川廣元、巴中、通江、茂縣、劍閣、梓潼、射洪、閬中、蒲江，重慶大足等地。佛教題材多為釋迦佛、彌勒佛、阿彌陀佛、釋迦說法、彌勒說法、釋迦多寶說法、阿彌陀淨土變（亦稱『西方變相』）、觀音菩薩等，亦有少量盧舍那佛、毗盧佛以及毗盧佛與彌勒佛并龕像。道教題材主要為天尊或天尊與老君并龕像。以下僅就主要造像

題材分述如左：

(一) 彌勒造像始于東晉，在四川最早的是茂縣南齊永明元年（公元四八三年）造的彌勒佛像，可見四川的彌勒信仰較早。其次是南朝梁大同七年（公元五四一年）武陵王蕭紀在成都興國寺造的彌勒佛像。隋唐以來，四川、重慶的彌勒信仰愈來愈盛，不僅彌勒佛造像增多，而且興起了造彌勒大像之風。廣元千佛崖第三八號北大佛窟中的主尊彌勒佛，是四川最早的一尊彌勒大像。這種大像之風一直綿延到宋代和明代，盛唐時的樂山凌雲山彌勒大佛創世界石雕佛像之最，四川十米以上的大佛像多達近二十尊，為中國之冠。

初唐時，著菩薩裝的彌勒佛像，除通江魯班石第二、三號彌勒窟外，在四川、重慶其他石窟中極少見。四川梓潼卧龍山第一號彌勒說法龕為初唐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鑿造，重慶大足尖子山第七號彌勒說法龕為初唐永徽元年（公元六五〇年）鑿造，主尊彌勒佛又均為螺髻、著佛裝的倚坐像。這種彌勒佛像多見于盛唐以降，但四川南朝已有着佛裝的單尊彌勒佛像，說明初唐和之前彌勒佛像既有着佛裝的，也有着菩薩裝的，祇不過著菩薩裝的彌勒佛像在四川并不多見。

(二) 淨土信仰自東漢末期已在中國流行，大乘佛教宣揚的淨土有：彌勒淨土、彌陀淨土、藥師淨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彌陀淨土。隋唐之際形成的淨土宗將彌陀淨土信仰推向了極致，按照《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雕刻的經變造像在四川、重慶很多。初唐時期，廣元皇澤寺第二八號大佛窟所表現的即是彌陀淨土，主尊阿彌陀佛及二弟子二菩薩造像雕刻精美，刻畫細膩，特別是後壁浮雕的人形化天龍八部護法像，在中國石窟中堪稱極品。梓潼卧龍山第三號是四川最早的阿彌陀佛與五十二間法菩薩造像，亦可稱為阿彌陀淨土變相。該龕鑿造于初唐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比通江千佛崖第六號、第二九號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造的阿彌陀淨土變相要早。四川這三龕阿彌陀淨土變相又比河南洛陽龍門萬佛洞永隆元年（公元六八〇年）的相同題材造像更早。勿庸置疑，梓潼卧龍山第三號貞觀八年所造的阿彌陀淨土變相，是中國現存有明確紀年的該類題材造像最早的。

(三) 彌勒佛與毗盧佛并尊題材在初唐時川北石窟中出現，說明在盛唐『開元三大士』創

立『純密』之前，四川已有『雜密』流布。同時，體現了初唐時期川北地區顯、密雙修的特質。如廣元千佛崖第一三號蓮花洞，該窟洞沿襲早期三壁三龕式窟型，中龕主尊為彌勒佛，右龕主尊為毗盧佛，左龕主尊為盧舍那佛。雖然不是按照密宗造像儀軌布局，但顯、密雙修的特點比較明顯。廣元千佛崖第三三號菩提瑞像窟，係從中心柱窟向中心方壇過渡的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制，並與左側的彌勒佛窟構成一組雙窟，以彌勒佛與毗盧佛並尊反映顯、密雙修的特點。同時，毗盧佛像較嚴格地遵循密宗造像儀軌雕刻，像身後鑿有靠背椅式大背屏，其兩端自上而下浮雕有密宗的『六拏具』^二形象。這種在背光上刻『六拏具』是密宗造像獨有的，在巴中南龕第三七號、北龕第一二號，通江魯班石第二、三號等窟龕中均雕飾有『六拏具』。^三初唐時期四川就有如此完整的密宗造像，在中國其他石窟中亦不多見，即使與北方、中原同期密宗造像相比，也難分軒輊。

（四）當隋末動亂時，社會上便流傳『天道將改，將有老君子孫治世』^四的政治讖言。李唐王朝建立後，自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並冊封老子為『玄元皇帝』、『大聖祖高上金闕玄元天皇帝』。大肆宣揚皇權神授，不遺餘力地推崇道教，以道為先，儒、釋為後，使道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初唐時，四川、重慶的道教造像活動較之隋代更為活躍。李唐王朝建立的翌年，即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便在綿陽西山觀出現了道教造像。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洞玄弟子辦法遷在綿陽佛祖岩造天尊像一龕。巴西縣（治所在今綿陽市東）雍龍伯在綿陽為大唐皇帝敬造天尊、老君等一百八十軀。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唐法真在綿陽造天尊像。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在綿陽玉女泉造天尊、老君像一龕，何某亦在同處造天尊、老君像一龕。從以上有明確紀年的道教造像可以見出初唐時綿陽造道像之盛，其題材多為天尊、老君或二者并龕像。

盛唐時期是李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黃金時代，北方、中原石窟藝術已登峰造極。但天寶十四載（公元七五五年）至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的七年間，發生了『安史之亂』，加之藩鎮割據，致使社會動蕩，戰爭不息，造成北方、中原石窟由盛而衰。相對穩定的四川、重慶不僅成為唐玄宗和大批文人藝匠的避難之所，而且給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帶來了新

的契機，並為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發展譜寫了嶄新的一頁。

盛唐自開元伊始到永泰元年這五十二年間，四川、重慶石窟造像幾乎未中斷過，特別是開元到天寶年間，四川、重慶佛、道造像尤為興盛。該期的窟龕造像主要分布于四川廣元、巴中、通江、南江、旺蒼、安岳、樂至、遂寧、營山、廣安、岳池、樂山、夾江、丹棱、眉山、仁壽、彭山、劍閣、綿陽、鹽亭、蒲江、邛崃、簡陽、資中、內江，重慶潼南、銅梁、合川、江津、忠縣等地。

盛唐時期，四川、重慶的佛教造像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雕刻和裝飾相當精美。主要題材如下述：

（一）佛說法像。這種題材多以釋迦佛為主尊，亦有一些以彌勒佛或阿彌陀佛為主尊的。主尊一般為結跏趺坐式，個別為立式，惟彌勒佛為善跏趺坐式（即倚坐式）。均呈說法狀，大多配置有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以及佛身後浮雕有菩提雙樹、三壁上部浮雕有人形化的天龍八部護法像。該題材造像主要見于四川廣元千佛崖、皇澤寺、觀音崖，巴中南龕、西龕、北龕、水寧寺，通江千佛崖、魯班石，安岳卧佛院、千佛寨，劍閣武連驛，綿陽開元寺；重慶合川濮岩寺、龍多山等石窟點。其中又以巴中的四個石窟點最多。釋迦說法像，保存完好且精美者為巴中水寧寺第八號，南龕第七〇、七一、七七號等窟龕。

此外，還有二佛并坐說法像，在四川、重慶石窟中有兩種：一是根據《法華經·見寶塔品》所造的釋迦多寶說法像，主要見于廣元千佛崖第二號，巴中南龕第四一、一〇六號，西龕第三四、四九號，水寧寺第一九號等窟龕。其中最精美者，是廣元千佛崖第二號多寶窟。二是根據《彌勒下生經》所造的釋迦彌勒說法像，在四川、重慶石窟中惟四川巴中水寧寺第三號一例。

（二）阿彌陀淨土變相。這是初唐時已有的題材，盛唐時漸多，雕刻藝術更臻于完美。如四川丹棱鄭山第三七、七一號，通江魯班石第一五號，巴中南龕第三三、六二、七八、一〇五、一一一、一一六號，西龕第三七、五三號，重慶合川龍多山第二四號等窟龕。其中巴中南龕第一一六號當屬這類題材的上乘之作。

西方淨土變相與阿彌陀淨土變相同屬彌陀淨土信仰，祇是依據的經典和造像布局有所不同。前者依據《阿彌陀經》，後者依據《阿彌陀與五十二聞法菩薩的傳說》。前者造像布局以阿彌陀佛及二脅侍觀音、大勢至菩薩構成的西方三聖為主體，三壁刻聽法四眾、七寶樓閣、七寶樹、七寶池、八功德水、池中蓮花盛開、空中飛天、伎樂、寶幢、寶網、迦陵頻伽、共命鳥等等，以此構成『無煩惱眾生住處』的西方極樂世界。後者造像布局以阿彌陀佛說法為主（也有左右配置觀音、大勢至菩薩的），三壁刻五十二（或五十，也有少于五十者）菩薩各坐長莖蓮花上聆聽佛法。西方淨土變相在四川、重慶石窟中相當多，而盛唐之佳構，莫過於四川丹棱鄭山第六二號西方淨土變龕。

（三）涅槃變。此係據《大般涅槃經》所造的表現釋迦佛滅度的情景。借以宣揚佛身常住不滅，涅槃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斷絕善根者）人皆得成佛的大乘佛教思想。這一題材在四川石窟中始見於盛唐時期，如廣元千佛崖第四、一〇號，安岳卧佛院第三號。廣元千佛崖兩窟的規模較小，但第四號睡佛窟正中設壇，除刻釋迦涅槃像和弟子舉哀外，二龍柱和娑羅雙樹直達窟頂，是仿中心柱窟的形制而變化的佛壇窟，較有特色。而且窟內三壁還浮雕有六女弟子奔走相告、自焚金棺、摩耶夫人與釋迦佛相對而坐話別、娑羅雙樹下九弟子與摩耶夫人圍金棺而坐、十四弟子抬金棺等情節，內容較為豐富。安岳卧佛院第三號涅槃變窟規模相當大，僅釋迦涅槃像就達二三米。其特殊之處是佛的卧姿有悖於佛經所謂『北首右脅卧，枕手累雙足』，而是刻為頭東脚西，左脅而卧。這種卧姿的涅槃像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碗廠鄉不意瓦衣^{〔四〕}石刻畫南區第四號上層正中亦有一例。此外，敦煌莫高窟，雲岡，龍門石窟有的涅槃變中的釋迦佛也是左脅而卧，在斯里蘭卡造于公元十一世紀的釋迦涅槃像亦是同樣的卧姿，其山勢同安岳相仿，即頭處高，腳處低。^{〔五〕}可見，卧姿的改變就山勢而因地制宜。有人認為佛左脅而卧是表現釋迦佛雙林入滅之前，在波伐河芒果林因體力不支而向左側躺下休息的情節。^{〔六〕}在佛傳故事『四相圖』、『八相圖』乃至『十二相圖』中均不表現這一情節，在『涅槃變』題材中，也不見表現這一情節的例證。作為信仰涅槃思想的施主在造涅槃變時，也不可能選擇這一鮮為人知的情節。再從安岳卧佛院第三號窟卧佛上方所表現的釋迦臨終說法